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6-0760-07

宋代的驿递制度与文学传播

谭 新 红

[摘 要] 文学的驿递传播指作品随同作者的书信进行传播。宋代的驿递制度相对完善,步递、马递、急脚递,分工明确,并且允许私人信件入递。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中,大量的诗词作品在遍布全国的驿路邮亭间往返寄送,进入传播轨道而被他人接受。驿递传播是一种反馈积极的传播途径,能刺激人们的创作热情,并催生精品。当然,它也有传播范围有限、传播速度较慢等缺点。

[关键词] 宋代;驿递制度;诗词;邮寄传播;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古代在有讯息需要交流的情况下,没有电话、网络之类的现代通讯工具,只有通过人工传递才能相互沟通讯息,驿递于是应运而生。宋代文学的传播同样如此,一首作品创作完毕,很多时候也是通过邮寄的方式传播开去。

一、宋代的驿递制度

我国古代的驿递制度,是承担接待过往官员、使节和邮递文书任务的交通制度。中国的驿递制度起源很早,殷商时就有了陆路驿递。刘勰《文心雕龙》卷五《书记第二十五》云:“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春秋之际,列国纷争,相互之间多有交往聘问,驿递书信变得频繁起来。

宋代实行文官制度,文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往往非常深厚。在两地悬隔的时候,他们通常是通过书信往来沟通信息、加深友谊,欧阳修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曾经说:

某不可往,圣俞不可来,奈何奈何?惟当一读新篇若会面,而圣俞惜不寄,又将奈何奈何?^[1](第33册,323页)

书信既提供了朋友的近况,很多时候还附寄新作供自己品评欣赏,人们自然是求之若渴。“一读新篇若会面”,成为文人的典型心理。宋代文人间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周紫芝在《〈姑溪三昧〉序一》中说:

自是无十日不通书,公亦不倦酬报。后三年而公亡,哀篋中所藏,得两牛腰。^[1](第162册,157页)

周紫芝和李之仪之间每隔不到十天就会通一次信,三年下来收到了李之仪“两牛腰”的信,这在古代的通讯条件下颇为不易。

为了满足信件往来日益频繁的客观需要,宋代的驿递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邮传上,可总结为六个方面:第一,驿与递分立,使递铺成为邮传的专门机构,便于管理,提高传递效率;第二,邮传之管控在中央统辖的前提下,地方行政长官分级典领督责,外加使臣巡辖;第三,递铺服役人员以卒代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军事化组织管理;第四,传递方式明确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第五,允许官员私书入递;第六,有关文书传递的法律条文比前代更加完整细密。这一系列制度的创新与

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驿传制度的重大变革和进步,也反映出宋代邮递事业的发达^[2](第144页)。

驿递制度创立之后,接待宾客与传递文书两种职能长期融为一体。唐代始有递铺之设,专门传递文书,但在全国尚不普及。到了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邮驿制度进行改革,建立起一套较为健全的递铺通信制度,将递铺与馆驿的职能分立开来,递铺专门承担文书及官物的传递任务及向过往官员使者提供马匹,驿则与供官员使者住宿的馆舍合并,成立专供接待的驿馆。

宋代递铺,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记载,分为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种:

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三等递铺中,步递靠人力传递,速度虽然最慢,但却是递铺的基础。一方面它不需要额外配备马匹,成本比马递小得多;另外,一些没有驿路的偏远地区和道路险阻的山区没有马递,只能靠步递。

马递是人骑马传递,所传文书主要是重要公文。由于马匹的速度快,所以规定一天最少要赶三百里路,以期按时将文件送达。

急脚递采用轻骑接力、昼夜兼程的传递办法,是比马递更加快速的递铺方式,能够日行四百里,主要传递朝廷紧急文书。

递铺是直接参与传递,馆驿则属服务机构,二者职能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设置范围、设置里程和设施都不同。洪迈《夷坚志》丙集卷一云:

每二十里置流星马铺,传递文书。七十里间则治驿舍,以为兵师往来宿顿处,士大夫过之者,亦寓托焉。

宋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卷十六也记载道:

县路十一铺,每铺相去二十里,此系诸县不通驿路处递传之路。

馆驿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食宿,只设于驿道上。馆驿之间的距离应该以步递在负重的情况下走一天的路程远近为宜,据洪迈的记载,这个距离一般为七八十里。递铺不仅设置在驿路上,也广设不通驿路的区域。其服务对象主要是马递,为了满足急脚递不断换马的要求,递铺之间的距离应以一匹马在负重的情况下能够急驰的最远路程为宜,从《夷坚志》和《景定建康志》的记载可知这个距离为20里。按照20里一处递铺计算,宋代的递铺当有数千处之多。这些递铺有的与驿路衔接,有的则分布在没有驿路的地方,以州县为中心向四方辐射,铺铺相连,形成了遍布全国的邮递系统。

在传递内容上,除了传递官方文书外,朝廷还允许递铺传递私人信件,这标志着宋代通讯范围的扩大。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记载,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十月,大臣张文灿等人因朝中诸臣多有交付家书以求传递的,遂向皇帝请旨,太宗下诏说:“自今的亲实封家书,许令附递,自余亲识,只令通封附去。”到了景祐三年(1036),仁宗又诏示天下臣僚,批准由驿站附递家书。官邮允许附递私人信件,对文学作品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此以后,一封封私人书信,附着大量的诗词作品,往返传递于大江南北。官邮成为文人联络感情、传播作品以及交流创作的主要方式。宋代驿递制度的变化使文学作品得到更为广泛、更加快捷的传播。

当然,驿馆递铺的设置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官方文书的通达和来往官员使客的畅通无阻,私人信件毕竟是次要的东西,再说官邮只是在有文书要传时才会传递,没有官方文件传递时私人信件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得以递送,因此官邮往往无法满足私人信件投递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另想办法。

一种办法是派专人递送。这种办法成本比较大,需要承担递送之人的食宿费及人工费,如果不是比较重要的信件,一般的家庭不会采用这种方法,家仆众多的官宦人家自当别论。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便寄”,即请人顺道捎带信件。便寄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除非委托的是信得过的人。当然,就古人而言,一般人都乐于成人之美。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总是会不失时机地托人向亲朋寄送信件,以传达信息,传递感情。文人则有时会寄上自己的诗词作品。如苏轼被贬琼州时,秦观“每有

讽咏,辄自作书,因便寄琼州。苏公谓其少子过曰:‘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皆辱与余游,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来者,递至少游所惠书诗累幅。近居蛮夷,得此如在齐闻韶也。’^[3](第3203页)同时被贬广东雷州的秦观就经常通过便寄的方式给远在海外的苏轼邮寄诗书。

虽然派人专送成本比较大,便寄则要看机会,不可避免地带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的特点,并且有时还不安全,但在官邮不能满足私人邮件递送的情况下,这两种邮寄方式又是对正规邮递的有益补充,在古代仍然是常见的邮寄方式,也是文学作品通行的传播途径。

二、宋代文学的邮寄传播

宋代文学的驿递传播指作品随同作者的书信进行传播。随着驿递制度的日益完善,特别是允许私人书信入递,通过邮递寄达自己作品的宋代文人日益增多。或者通过官邮,或者是私邮,或者是便递,文人们会想方设法将自己新近创作的作品传递给身处异地的亲朋好友、同僚故旧,这些作品遂在遍布全国的驿路邮亭间往返寄送,进入传播轨道而被他人接受。宋代文学传播的途径虽然多种多样,但交由驿递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文人在外做官,很多时候会远离自己的亲人,他们往往会邮递作品向亲人诉说自己的苦闷和人生的失意,如靖康初主战派人士欧阳珣在奉命回京的途中就寄词给妻子:

欧阳全美名珣,庐陵人,登崇宁进士第。靖康初,全美调官京师,时金人欲求三镇,全美行次关山,以乐府寄其内曰:“雁字成行,角声悲送,无端又作长安梦。青衫小帽这回来,安仁两鬓秋霜重。孤馆灯残,小楼钟动,马蹄踏破前村冻。平生牵系为浮名,名垂万古知何用。”^[4](第3268页)

欧阳珣在词中表达了悲凉寂寞的心情和人生苦短而又为浮名浮利所牵系的无奈情感。张耒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则用诗歌《十月十二日夜宿寄内》诉说自己的羁旅况味:

夜寒欺老人,展转睡不足。长年怕为客,况此空斋宿。嚙嚙度云雁,瑟瑟受霜竹。冻散冷如植,未觉重衾燠。天明起盥栉,淡日初照屋。寄声家具酒,买鱼烹雁鹜。^[5](第13334页)

诗人用朴素的语言,抒写客居在外的艰苦生活和渴望回家的急切心情。对夜寒身冷的刻骨描写,未尝不是诗人晚年受到新党排挤打击的一种情感外现。

如果说游宦的丈夫在写给亲人的信中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感喟,独守空闺的妻子则往往会将自己满腔的思念之情化为一首首诗词邮寄给丈夫,据题为伊世珍所作的《瑯嬛记》卷中引《外传》所言,李清照的名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就是寄给在外做官的丈夫赵明诚的:

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阙,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政易安作也。

全词情深词苦,“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情感真挚感人。高宗绍兴年间,太学生郑文允寓行都,妻子孙夫人也将思念之情和独居之苦通过邮寄词作向丈夫诉说:

太学服膺斋上舍郑文,秀州人,其妻寄以《忆秦娥》云:“花深深。一钩罗袜行花阴。行花阴。闲将柳带,试结同心。日边消息空沉沉。画眉楼上愁登临。愁登临。海棠开后,望到如今。”此词为同舍所见,一时传播,酒楼妓馆皆歌之。^[6](第1227页)

孙夫人寄的词被丈夫的太学同学见到,于是盛传开去,连酒楼妓馆都纷纷演唱。由于郑文长期滞留京城,孙夫人多次给他寄词,据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引《乐府纪闻》可知,除了这首《忆秦娥》,孙夫人还给丈夫寄过《南乡子》、《风中柳》词,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她对丈夫深切的忆念之情。

亲人之间邮寄诗词并不限于夫妻。苏轼和苏辙兄弟情深,他们经常通过书信传达手足之情。神宗熙宁四年(1071),因对王安石变法持有异议,苏轼被外放任杭州通判。刚一到任,苏轼就给苏辙邮寄诗歌《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倾诉自己无可奈何和忧谗畏讥的复杂心情。苏辙立马次韵回赠,劝慰苏轼说

杭州的山水宜人,希望他在那里能够尽心为政^[5](第9149、9861页)。张耒《送婿陈景初还钱塘》云:“饱读陈编勤笔砚,书来寄我好文编。”叮嘱女婿陈景初到杭州后要勤于笔耕,并将“好文编”寄给自己欣赏。

歌妓与词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词人填写的词需要歌妓演唱传播,歌妓也需要词人提供优秀的作品,因此他们之间交往频繁,时常会因“业务”关系而通信往来,如临邛秋官张才翁为了引起郡守张公庠的注意,就与歌妓杨皎上演了一出诗词快递的好戏:

白云先生之子张才翁,风韵不羁,敏于词赋。初任临邛秋官,邛守张公庠不知之,待之不厚。临邛故事,正月七日有白鹤之游,郡守率属官同往,而才翁不预焉。才翁密语官妓杨皎曰:“此老子到彼,必有诗词,可速寄来。”公庠既到白鹤,登信美亭,便留题曰:“初眠官柳未成阴,马上聊为拥鼻吟。远宦情怀消壮志,好花时节负归心。别离长恨人南北,会合休辞酒浅深。欲把春愁闲抖擞,乱山高处一登临。”杨皎录此诗以寄,才翁得诗,即时增减作《雨中花》一阕,以遗杨皎,使皎调歌之。(词略。)公庠再坐晚筵,皎歌于公庠侧。公庠怪而问,皎进禀曰:“张司理恰寄来,令杨皎歌之,以献台座。”公庠遂青顾才翁,尤加礼焉。^[6](第38页)

杨皎先将张公庠的诗寄给张才翁,张才翁将诗歌增减为《雨中花》后寄回给杨皎,让她在当天的晚筵上演唱以引起张公庠的注意。张才翁必定是派专人快递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柳永在江淮也曾眷恋过一位歌妓:

柳耆卿尝在江淮眷一官妓,临别以杜门为期,既来京师,日久未还,妓有异图,耆卿闻之快快。会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击梧桐》以寄之……妓得此词,遂负愧竞产,泛舟犍下,遂终身从耆卿焉。^[6](第25页)

这位歌妓收到柳永寄的词后,决定终身追随这位贫穷的才子词人。关汉卿的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而成。

当然,文人之间邮寄作品更为常见,他们需要传达友谊、切磋诗艺词艺,更希望知音见赏。王禹偁《酬赠田舍人》云:“行春多暇吟情发,闲作长歌寄同列。”同僚之间有时会互寄诗词以致问候,如孔平仲《谈苑》卷二记王琪知歙州时,吴感作《折红梅》寄之,王琪根据词意回寄了两句诗给吴感:“山花冷落何堪折,一曲红梅字字香。”有的下层文人会寄作品给地方长官,如岳珂《桧史》卷二记载江湖词人刘过有事不能赴越帅辛弃疾之约,于是效辛体作《沁园春》一词寄给辛弃疾,并得到了辛弃疾的赏识。郑侠也给帮助自己修建房子的知县李君宝寄过词:

故自温陵还家,即至府下,亲自措置,得一阁之材归,而营诸寝室,即朝夕其间,四壁回环。惟仰闚一窗,而席其下。即有《西江月》之阕,其词曰:“寝室新营小阁,蠹书旧柱前楣。分门辨帙列东西,顿有飘然意气。举世皆从物役,吾心独许书痴。蓬头垢面忘寒饥,不特闻《韶》滋味。”^[1](第99册,288页)

在写给李君宝的这封信中,郑侠虽然没有多少感恩戴德的话语,但却写出了自己飘然不群的个性,在自己书斋生活的描写中实际上也隐含着对知县的感激之情。

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更为频繁,在信中附寄自己的作品成为传达友谊的最佳方式,如苏轼曾给陈季常寄《瑶台曲》,并叮嘱他不要轻与人言:

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妄与人云。“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偷啼自搵,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来解幽愠。低云鬓,眉峰敛晕,娇和恨。”^[4](第2053页)

从秦观写给黄庭坚的一封信中更可见出当时文人之间通信主要是一种文艺交流和文学传播活动:

及辱手写《龙井》、《雪斋》两记,字画尤清美,殆非鄙文所当。已寄钱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书,及手写乐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讽味久之,窃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后公十数日遂过此,南如晋陵,为留两日。《斗野诗》、《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诗皆和了,今录其副案上。所要子由《金小诗》并其所属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韵

《斗野亭》、黄子理《忆梅花》诗,凡四首,亦随以呈,聊发一笑耳。^[1](第 119 册,344 页)

这封短短的书信提供了很多信息,既传达了自己已经收到黄庭坚诗词的讯息,又透露了自己收到这些作品后积极的接受态度,还将自己的和作及其他作品一并奉寄。这封信一共提到了十余首诗词作品,这些作品通过秦观与黄庭坚的几封书信得到往返传播,可见邮递作品在当时是一种颇为常见的传播途径。

文人不但邮寄自己的作品,有时也附寄他人诗词,如张奕就曾将刘过题岳飞庙《六州歌头》词寄给武昌的朋友:

刊是词,欲寄武昌故人,立于王庙内,书之以寓感慨云。^[1](第 290 册,449 页)

李之仪长期寻求黄庭坚的两首词而不得,后来还是朋友杨庶之邮寄给了自己:

予居当涂凡五六年,鲁直所寓笔墨无不见之,独求此二词竟不知所在。比迁金陵又二年,

一日杨君庶之以书见抵,并以之相示而求记其后,方知在杨氏,盖深藏不妄示人也。^[1](第 112 册,134 页)

为了扩大传播范围,文人有时还将同一首作品寄给不同的人,范仲淹《与石曼卿书》云:“近诗一轴,寄予足下与滕正言。达于诸公,必笑我也。”向子諲《西江月序》亦云:“时拜御书芻林之赐,因成长短句,寄朱子发、范元长、陈去非翰林三学士,以资玉堂中一笑。”范仲淹将自己的诗寄给石曼卿和滕正言,向子諲将《西江月》一次就抄寄三人,传播意识都非常明显。黄庭坚的《以酒渴爱江清作五小诗寄廖明略学士兼简初和父主簿》、《答明略并寄无咎》,也都是将同一首诗歌寄给不同的人。

为了节约传递成本,文人有时一次会寄多首作品,如苏轼就曾一次寄给李公择四首《菩萨蛮》词:

效刘十五体,作回文《菩萨蛮》四首寄去,为一笑。不知公曾见刘十五词否?刘造此样见寄,今失之矣。^[1](第 87 册,442 页)

古人由于寄信机会难得,一次所寄不限于一种,诗词兼擅者往往会诗词兼寄,如黄庭坚就曾一次收到别人所寄诗词各一篇:

得元明二月十四日 卯书,寄诗一篇、《青玉案》一篇、滑石压纸五枝。^[7](第 9 册,11 页)

苏轼官泗州时也曾一次收到王定国托人转带的六首诗和一首词:“今日景繁到泗州,转示十月二十三日所惠书并新诗六首、妙曲一首,大慰所怀。”^[1](第 87 册,471 页)

词人不但邮寄单首作品,自己的集子刊行后,除了售卖,也会拿出一部分邮寄给亲朋好友,其意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播作品,扩大影响。据苏辙《寄张芸叟并引》记载,张舜民将自己的乐府诗编成集子后寄给苏辙,在信中还关切地询问苏辙的手疾,苏辙很是感动,回赠了首小诗以示谢意:“老矣张芸叟,亲编乐府词。才高君未觉,手战我先衰。”词人汪莘 54 岁那一年,从中秋之日到孟冬之月一共填了 30 首词,想给自己吴中的朋友各寄一本,“穷乡无人傭书,乃刊木而模之,盖以寄吾友尔,匪敢播诸众口也”^[1](第 292 册,136 页)。表面上说只是寄给自己的朋友,如果能够播诸众口,汪莘自然也是求之不得。宋谦父也曾将自己新刊行的词集寄给戴复古:“壶山宋谦父寄新刊雅词,内有《壶山好》30 阕,自说平生。仆谓犹有说未尽处,为续四曲。”^[8](第 2969 页)这个词集里仅《壶山好》就有三十阕,部头应该比较大。

文人有时是主动寄作品给对方,有时则是应人之请而寄。文人之间通信免不了向对方索要作品,如欧阳修《与梅圣俞书》四一就说:“前承惠《白兔诗》,偶寻不见,欲别求一本。”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记载谢逸向潘大临索取新诗,潘大临回信说:“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时人都笑其迂阔。鲜于子骏也曾向苏轼索诗,苏轼无暇写诗,于是将《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寄给他:“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1](第 88 册,41 页)苏轼在信中对自己新近创作的这首豪放词颇感得意。关系好的人之间一般是有索必应,比如章质夫向苏轼索琵琶歌词,苏轼就“不敢不寄呈”^[1](第 88 册,368 页)。

正是在这种或主动邮寄或索请与应请的风气中,诗词作品沿着宋代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快速地传

递着,交通繁忙的驿道同时也成为文学作品流播的主要路线。

三、驿递传播的优点与不足

文学作品的邮寄传播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它是一种反馈积极的传播途径。书信是经过传递而相互沟通讯息的双人文体,收信者收到信后一般都会在短时间内写回信给寄信者,反馈给寄信者相关的信息。如果寄信者附寄的有诗词作品,收信者在回信中一般都会对作品进行评论。他们或是赞誉对方邮寄的作品,如苏轼收到蔡景繁的词后就称赞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晚即面呈。”^[1](第88册,183页)或对作品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如苏轼就批评陈季常的词豪放太过:

别后凡四辱书,一一领厚意。具审起居佳胜,为慰。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谢章寄去。闻车马早晚北来,恐此书到日,已在道矣。^[1](第88册,55页)

黄庭坚也曾批评郭英发填的词辞胜乎情而不能打动人心,并且还作了几篇范文邮寄给对方:

所作乐府,词藻殊胜,但此物须兼缘情倚靡,体物浏亮,乃能感动人耳。辄拟作三篇,不知可用否?^[1](第105册,70页)

他还曾在信中指导外甥洪刍如何提高自己的诗文创作能力:

驹父外甥教授:别来三岁,未尝不思念……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继以叹息。少加意读书,古人不难到也。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1](第104册,300页)

从他们的回信中我们发现,宋人在私人通信中探讨文学作品时一般不文过饰非,而是比较客观地指出作品的优点和不足。这样的信息反馈给作者,自然会使他们有所改进,从而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来。而在其他公开出版物或公开场合中,碍于交情,难免会互相标榜,这种临文不讳的作风就要打些折扣了。

其次,文人不会将漫不经心的拙劣之作邮寄给别人,寄出去的作品一般都是经过精心构思并进行认真修改后的佳作。欧阳修“尺牋单简,亦必立稿”^[1](第10册,266页)。黄庭坚在《答人简》七中也说:“比因检书,见东坡一篇听琵琶缠头曲,甚妙,不审曾见之否?或须,当以大字写一本付大张也。亦思作听道人欢一曲,偶有数字未可意,后信并寄矣。”^[1](第106册,69页)欧阳修写信要打草稿,黄庭坚觉得自己作品中还有几个字不惬人意而不愿草率寄出去,可见邮寄会使作者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不修改完善是不会轻易示人的。文章不厌百回改,一些佳作名篇的诞生看来也有邮寄一份功劳。

邮寄还会刺激人们的创作热情。在书信流通中,对方收到寄作后,往往马上回寄作品,酬唱赠答,这就使得同调、同题、同韵之类的和作大量产生,丰富了宋代文学的宝库。如苏轼收到章质夫《柳花词》后,就次韵了一首回寄给章质夫:

《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七夕词》亦录呈。^[1](第88册,150页)

黄庭坚的伯父给他寄来诗歌,“意欲庭坚和之”,黄庭坚与几位朋友一起为这首诗写了和作并寄还给伯父^[5](第11583页)。刘辰翁在收到长辈李云岩《百字令》赤壁词后,不敢怠慢,匆匆和韵一首寄去,并在信中希望对方能够给予指导^[8](第4089页)。酬唱赠答的过程,既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力,也催生了新的作品。有时回寄的致谢文字并非和作,如秦观将《黄楼赋》寄给苏轼,苏轼写了《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在诗中他赞誉秦观的赋“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9](第9264页),同样促进了新作品的诞生。

文学作品通过书信传播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它的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在书信传播中,传播主体是个体文人,传播对象是他的作品,接受者则是另一个体文人,其他人一般不能介入传播过程。这使受众的数量极其有限,除非接受者能进行二次传播,如歌妓收到词后在宴会上演唱,文人收到诗后不是私密而是展示给他人看或是在公众场合吟诵,但这已不是书信传播的功效了。

其次,我们说宋代邮传制度很发达,只是相对前朝而言,宋代的通讯条件毕竟还是很有限的。一方面,文人书信、诗词文稿属于常行文书,并非急务,所以一般不允许专门传递紧急文书的马递、急脚递传递私人信件,而步递的速度就比较慢了,黄庭坚《答王观复》一文给我们提供了较为直观的描述:

见和东坡《七夕》长短句,及“可惜骑鲸人去”之语,既嘉足下好贤,又深叹古来文章之士,未尝不尔也。草草和成二章,言无可采,当面对一笑耳……但有乐府长短句数篇,谩往……今问得自富顺入资,遂。由果至阆十五驿,徒行不重载,十日可到。二人供给米三斗,钱一千,计不至馁于道矣。^[1](第 105 册,251 页)

在不负重的情况下,十五驿的路程步行需要十天,步行比较快的人一天只能走一点五个驿,路途更为遥远的地方花的时间更长、花费也更多,可见在宋代一封信要传达给对方还是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苏轼被贬黄州时,收到朋友文与可的作品后多次写信道谢:

《凤味》等诗,屡有书道谢矣。岂皆不达耶?睽远可叹,皆此类也。向有书,乞《超然台》诗,仍乞草书,得为摹石台上,切望切望!^[2](第 89 册,56 页)

文与可之所以一次都没有收到苏轼写的感谢信,主要是因为路途遥远而传递速度太慢所致,这影响了作品传播的时效性。

宋代的馆驿并没有遍及全国,太偏远的地方就没有设置邮传,孔武仲在《上曾内翰》中就说:“南方最远于京师,下邑不通于邮置。”^[3](第 100 册,191 页)此所谓“南方”,至少指广东、海南诸省。苏轼被贬惠州时,他的朋友佛印就因为无人邮递书信而忧虑不已:

东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远无人致书为忧。有道人卓契顺者慨然叹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请书以行。印即致书云:“……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7](第 7 册,第 69 页)

道士卓契顺替和尚佛印给苏轼传书,亦千古佳话矣。从“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的话可以体会到卓契顺当时慷慨的心情,也可以见出其时通讯的艰难。

[参 考 文 献]

- [1] 《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 [2]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3] 《宋人年谱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4]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 [5]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6]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7] 《全宋笔记》第二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年版。
- [8] 《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责任编辑 何坤翁)